



◎美在生活

# “清玩”与文人生活美学

□赵强

## 声色之外：感官的开发与完善

闲赏“清玩”，是人与物的互动。陈眉公在《小窗幽记》说：“清闲之人，不可惰其四肢，又须以闲人做闲事。”他所说的“闲事”，就是把自己沉浸于清雅幽远的“清玩”之中，使感官与身体获得充分的快适和愉悦，如“临古人帖，温昔年书，拂几微尘，洗砚宿墨，灌园中花，扫林中叶”等，然后“觉体稍倦，放手匡床上，暂息半晌”。

据此可知，“清玩”之“玩”，并非与对象隔绝的静观式审美，而是感官乃至身体全面介入，从声、色、嗅、味、触等感官知觉到肢体律动，充分发现、体验和占有对象之美。公安才子袁宏道说自己毕生追求的“真乐”有五，首屈一指便是“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安，口极世间之谭”（《与龚惟长先生》）。这看起来颇有纵情声色的嫌疑，然而他所说的“极”，并不在于持续强化和满足声色之欲，而是积极开发自身感官知觉能力，拓展生活经验的广度和深度，进而超越声色，与“物外之趣”相逢（《叙陈正甫《会心集》》）。这种“物外之趣”，就是万物及世界的无限丰富性和可能性。它如同清人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所说的美人之媚态、火之焰、灯之光、珠贝金玉之色，“是物而非物，无形似有形”，难以理性和文字晓谕，却可以感性的方式抵达。

而“清玩”之“清”，亦即对象所引起的美感，也不止于其本身质料、色彩、形式层面所引发的快感，而是立足于此，在人与物的互动中，唤醒更具创造力、想象力的积极审美体验，为人超越声色，拥抱声色之外无限的丰富性和可能性架设了津梁。如宣德铜炉，“薰燎既久，敷色渐磨，铜质显露，如良金在冶，晶光发越，宝焰陆离，莫可云喻”（项元汴《宣炉博论》）；如宜兴紫

◎家风家训

# 林则徐：志高行洁 经世为国

□水海刚



近代中国的大变局中，林则徐无疑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观其一生，林则徐之所以能在近世大变局中发挥挽狂澜于即倒的作用，与林家的家风熏陶有莫大关联。

林氏的家风，可总结为8个字：“志高行洁，经世为国”。十九世纪的中国，积弊重重，有识之士莫不希望以自

砂壶，“人用久，涤拭日加，自发闾然之光，入手可鉴”（周高起《阳羨茗壶系》）；又如端溪砚，长期蓄养，扣之则“其声清越”，观之则“紫气闪闪，如画家著胭脂之色”（程瑶田《纪砚》）……可以说，鉴赏“清玩”是生成性、创造性的审美过程。在此过程中，人的感官获得了充分的开发，并走向完善。

## 有情之物：营造诗意生活空间

我在《“物”的崛起——前现代晚期中国审美风尚的变迁》一书中曾提出，明清文人生活美学的要旨，在于用“物”来创造一种审美化、艺术化的日常生活空间。生活本身被他们视为施展才华、表现情致、体验美感的“作品”。这一作品追求的生活情境是“过目之物，尽是图画；入耳之声，无非诗料”（李渔《闲情偶寄》）。

“清玩”自然成为如诗如画的生活情境的重要构成元素，其品色、形制和位置陈设，都被放置在生活的时间之流和空间布局中精心擘画。由此，“清玩”也被赋予浓烈的抒情性和表现性。明清之际的沈春泽在为文震亨《长物志》所作的序中说，收藏和鉴赏“清玩”的雅好，“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但对反映或洞察一个人的才、情、韵来说，却必不可少。李渔更进一步指出，器玩的选择与陈设，在才华和情趣之外，还事关胸中韬略——人若能在位置“清玩”时充分施展才略，“使人入其户登其堂，见物物皆非苟设，事事具有深情”，那他也一定怀有庙堂经济的潜质。

从这种意义上说，美就成为贯穿明清文人修身、齐家甚至是经世的价值理念。只要拥有“一段闲情，一双慧眼”，无生命的物就能充盈勃勃的生机，现实功利世界也会转化为有情世界。这生机与情趣，自然源于依照美的

“清玩”，又称“清供”或“清赏”，是指那些不切日用、非饮食起居所必需的美好之物。因其不切日用、非饮食起居所必需，故常被视为“长物”，亦即“多余之物”；又因其多余而美好，也就是超越食色之欲且富于审美品质，所以就被冠以“清”的名号。

“清玩”的历史颇为久远，名目亦浩繁多端。自六朝以降，它就逐步成为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消闲娱情的重要对象；其包罗的范围，也从文房器具、书画、古董、金石渐次拓展到奇石、异香、林壑、漆茗、卉木、禽鱼，乃至瓷器、漆

理想和艺术的法则来营造生活空间的实践。就这一时期常见的折花插瓶来说，袁中郎《瓶史》曾谓：“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过二种三种，高低疏密，如画苑布置方妙。置瓶忌两对，忌一律，忌成行列，忌以绳束缚。夫花之所为整齐者，正以参差不伦，意态天然。”这诸多的机宜与禁忌，正是明清文人审美鉴赏力与艺术创造力在生活实践中的显现。

## 活泼之心：人生境界的开拓

众所周知，明清是小品文昌盛的时代。而“清玩”“清赏”，则构成了明清小品文的大宗。

小品文之“小”，是相对于经世文章、庙堂文学之“大”而言的。然而，就像林语堂所言，经世文章“禁忌甚多，蹈常习故，谈不出什么大道理来”，反倒是小品文“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自由灵活，‘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一不可入我范围”，开拓了中国文艺的新境界。

以“清玩”“清赏”为主题的小品文，在这种境界拓展和提升的过程中居功至伟。按照明清文人的说法，“清玩”比之于庙堂经济，自然是“小道”，但“亦有可观焉”——人们在“清玩”中所观所感的，是“古今清华美妙之气”，它可以拂去蒙在人心之上的食欲欲望与世俗功利的尘垢，从而使人生露出自然的、活泼的本心。如同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所说：“坐陈钟鼎，几列琴书，拓帖松窗之下，展图兰室之中，帘枕香霏，栏槛花妍，虽咽水餐云，亦足以忘饥永日，冰玉吾斋，一洗人间氛垢矣。清心乐志，孰过于此？”从活泼的自然本心出发，人生所适，无非趣味，终能突破原始欲望和现实功利、道德的束缚，开辟出一种自由的人生境界。这自由，不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而是心无挂碍，“随心所欲

器、竹器、锡器等。到明清时期，“清玩”更是别开生面，不仅凸显为文人生活中赖以消遣自适、构建艺术化生活情境的主要资源，而且成了借以确证身份、标榜风雅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正如时人所谓，当日雅俗之分，就在于“清玩”之有无（吴其贞《书画记》）。因此，即便资用不丰的贫士，也“必焚香，必啜茗，必置玩好”（孙枝蔚《树斋记》）。就此而言，明清文人间蔚然成风的流连“清玩”、醉心“清赏”的生活时尚，为我们体察其生活美学的观念、智慧和方法提供了绝佳门径。

不逾矩”。

当今时代，日常生活业已高度审美化，悦耳悦目之物，声色各异、名目繁多，并且以几何倍数日新月异增长。置身于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接的物的包围中，我们如何在物的声色之外，体验“清”的趣味、创造美的生活、抵达自由的境界？这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挑战，也是我们返回历史，寻找生活美学智慧的契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清之际的日常生活启蒙与美学转向研究”[16CZW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明宣德铜炉



宜兴紫砂壶

◎文明密码

# 稻花香里说丰年

□杨雪梅



炭化稻米 新石器时代，距今8000年左右  
1995年湖南省澧县梦溪乡八十垱遗址出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水稻是仅次于玉米的世界第二大粮食作物，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以此为主食。对于亚洲人来说，水稻就更为重要了，全世界90%以上的稻米产于亚洲，中国则是世界水稻播种面积第二、产量第一的国家。

什么人在何时何地驯化了水稻？一百多年来关于稻作起源的讨论吸引了植物学家、农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分子生物学家的前仆后继。

第一位系统地讨论栽培作物起源的学者，是19世纪瑞士植物学家阿方斯·德康多尔。当时因为在印度发现了很多野生稻，他提出印度是水稻的起源地。他还注意到欧洲的语言中“稻”或者“米”这个词的由来都与梵语有关，从词源关系可以看出水稻是从印度开始传播的。苏联学者瓦维洛夫也提出了作物起源中心就是现存的栽培品种和近缘野生种基因多样性最高的地方这一假说，他曾经考察过全世界很多地方，采集了大量标本和种子，最后也把水稻的起源地判给了印度。

这个观点自然遭遇中国学者的质疑。著名农学家丁颖自1926年在广州郊外发现野生稻之后，提出了“水稻起源于中国华南地区”。全世界的水稻品种虽多，但大体上可以划分成两类——籼稻和粳稻。籼稻一般来说比较喜暖，大多种植在亚热带和热带低海拔地区，粳稻一般说来较为耐寒，大多种植在亚热带和热带高海拔地区及温带，中国栽培的水稻既有籼稻又有粳稻，印度栽培的水稻几乎都是籼稻，这也是丁颖极力主张水稻原产中国的依据。

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7000年前人工栽培稻的横空出世，使得对于水稻起源的研究转变到考古学领域。考古学家严文明在20世纪90年代初，根据我国考古遗址出土的早期稻作遗存提出了“水稻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观点。随着植物考古在中国的快速成长，水稻遗存在大量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遗址中被发现，如湖南澧县彭头山、湖南道县的玉蟠岩、江西万年仙人洞、河南舞阳贾湖、浙江余姚田螺山、萧山跨湖桥等等。这些遗址的年代大多在距今7000年以上，最早的遗址年代接近距今1万年。

最近一段时间引起较多关注的是浙江浦江的上山遗址。2001至2008年的考古发掘表明，当时生活在这里的古人曾使用稻壳和稻叶作为掺和料制作陶器，遗址还出土了极少量的炭化稻米。测年数据显示该遗址的最早年代可早至距今11000年。负责进行植物浮选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志军说，上山文化时期的炭化稻米是目前通过系统的浮选法在层位清晰的考古遗址中发现的最早的稻米遗存。上山遗址已经发现围壕和居住址等迹象，尤其是遗址的早期文化地层中出土了一些红烧土残块，这些红烧土块内掺杂了大量的炭化稻壳。这里的陶器在制作过程中已经在制陶的坯土中掺入了大量稻壳，是为了增加陶器的透气性和传热性，如同商周时期做铜器的陶范，为了使表面更加细腻，会加入大量的稻壳灰。掺入稻壳硬壳的普遍现象不仅显示出上山先民制作陶器的特色，而且证明了稻与上山人的密切关系。

野生稻与驯化稻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生物性状的差别，其中最主要的两项与植物自身的繁殖方式有关，一是落粒性，二是种子休眠性。野生稻的种子在成熟之后会自然散落，进入泥土，之后在适宜的气候条件下再长出新的植株。如果遇到气候条件不佳的情况，种子可以在泥土中长期休眠，而且不腐烂，直到外界条件适宜再萌芽。然而，人类种植水稻是为获取籽粒供自身食用，因此驯化稻在成熟后并不会自动落粒，而是需要人类收割之后进行脱粒。此外，为了保证播种后的萌芽率，驯化稻种子的休眠性相比于野生稻也大大降低。这些不同也是用来区别水稻是否被驯化的重要依据。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吕厚远研究员的团队，长期以来致力于植硅体的分类学研究，植硅体不但可以测年，而且通过对水稻扇形体边缘鱼鳞状纹饰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区分野生稻与驯化稻。他们将这一方法也用于上山遗址。最新的测试结果表明，该遗址的最早年代至少可距今9400年。此外，对其中水稻扇形体的鉴定分析显示，在上山遗址的最早阶段，鱼鳞纹数量大于等于9的水稻扇形体所占比例高达36%，远高于现代野生稻17%这一比例。结合由已知数据推测的水稻驯化速率，可以推测长江下游地区水稻的开始时间必然早于目前所知的9400年。

这项研究也表明，中国长江下游地区水稻驯化的时间与西亚的小麦、中美洲的玉米开始驯化的时间基本同步。赵志军认为，在中国，水稻的驯化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点，它是一片大的区域，从时间概念上讲，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上山遗址是一万年前早期稻作农业阶段的代表，那时人类已经开始影响稻的驯化，在距今8000年的时候，这一过程出现了大的飞跃，在河南贾湖出现了完善的聚落遗址、规模很大的加工作坊，这些迹象表明，稻农开始出现，生产工具开始细化，收耕工具出现，稻谷的驯化在加速。距今6000年前后，田螺山遗址的古稻虽然还有许多野生稻的特性，但稻谷的驯化已基本稳定，之后的基因变化不太显著。到了55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生产系统已经相当完善发达了。

（作者为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